

不管、不急、不壓」的態度是正確的。他說：「現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鬥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頁700-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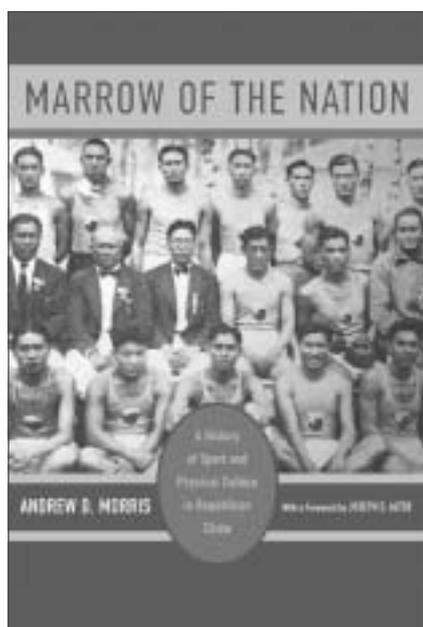
通過作者的這番整理，我們不難發現毛對於武鬥其實也是比較讚賞的。這就與過去一些強調毛提倡

「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說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砸爛舊世界》能通過一份史料發現他人未曾發現的信息，着實可見作者敏銳的洞察力。

除了上述這些特點外，《砸爛舊世界》一書還有用語凝練、敘述風格獨特等特點。總而言之，這是一部值得細細品味的好書。

## 近代體育與中國的現代化

• 劉 玄



Andrew D.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008年8月，第二十九屆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在中國北京舉行。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又一次贏得了世界的關注。中國運動員在這場運動會中取得的驕人成績(51枚金牌、100枚獎牌、高踞金牌榜首位)以及成功舉辦這場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奧運會，不僅成為中華民族自尊與自信情感的資本，同時也讓整個世界為之驚訝稱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認為，北京的好客和效率給來訪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也給全球觀眾展現了一個經濟和政治強國的興起。奧委會主席羅格(Jacques Rogge)在奧運會後也再次宣稱選擇北京作為主辦國為一個正確選擇(Jim Yardley, “After Glow of Games, What Next for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24 August 2008)。通過奧運盛會，中國向全世界展示一個正在變化和進步的形象。

源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以球類、田徑等競技運動為代表的近代體育，並非傳統中國土生土長的產物。傳統中國的體育文化，在社會中並未達到大眾普及的程度，而且與近代體育的發展趨勢漸行漸遠。

《民族之髓》的主旨在於展示體育運動在塑造中國個體現代化上所起的作用，具體來說，即中國人從帝國臣民逐漸到理應享有個體權利與義務的國家公民的轉變過程。

然而，源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以球類、田徑等競技運動為代表的近代體育，並非傳統中國土生土長的產物。傳統中國的體育文化，從儒家教育要求學生掌握的六項技能(六藝)中的「射」、「禦」，到體育遊戲「蹴鞠」、蒙古的摔跤以及中國武術等，在傳統社會中都未達到大眾普及的程度，而且與近代體育的發展趨勢漸行漸遠。

近代體育約在十九世紀60年代傳入中國。首先傳入的是在清末新軍和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學堂中出現的兵式體操和普通體操，目的在於進行「尚武」的「軍國民教育」，然後是在公立、私立學校中開設的田徑、球類、游泳等各種近代運動項目及其競賽。近代體育在中國的傳入及發展，烙下了深刻的時代印記。美國學者莫里斯(Andrew D. Morris)的著作《民族之髓：中華民國體育與身體文化史》(*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就以體育為切面，給我們展示出一個不同的中華民國社會。

作者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師從美國中國學大家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這部著作是其博士論文的修改版。為完成這篇論文，他在台灣進修了一年，之後又去了杭州，在此期間訪問了大量的中國學者以及體育運動員，搜集了大批的相關資料。全書共分為八章，以國家、民族、性別、社會和政治為線索，論述了從1910到1949年中國體育文化的發展過程。下面將對全書的內容做一大致介紹。

第一章是導論。作者首先引述了晚清民初外交官伍廷芳在《一個東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國》中關於體育運動的一段論述：「沒有甚麼能比體育運動更能反映中西雙方之間的差異的了，在中國，無法想像一群人會因為看一場比賽而聚集起來，中國還沒有現代化到那個程度可以花費半天去觀看別人在玩。」(頁1)接着，作者引述了1907年天津的一本傳教士刊物中對中國體育提出的三個問題(「奧運三問」)，即中國甚麼時候能派出自己的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中國甚麼時候能派出一支參賽隊參加奧運會，中國甚麼時候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舉辦奧運會。借這兩個引述，作者指出全書的主旨在於展示體育運動在塑造中國個體現代化上所起的作用，具體來說，即他們從帝國臣民逐漸到理應享有個體權利與義務的國家公民的轉變過程。

第二章名為「鍛煉的樂趣現在可以實現了」，作者介紹了1910年代的中國體育文化從體操到體育的轉變過程。第三章名為「頭腦、力量與財富」，介紹了1920年代的體育發展狀況。第四章討論了1920年代體育文化中的民族主義和權力問題。第二到第四章作為一個整體，分析了從1910到1920年代英美競技運動和文化在中國的傳入與發展過程。作者指出，在1910年代，通過中國許多教育家和官員的提倡，英美競技運動逐漸取代了德國、瑞士和日本的體操，成為中國體育運動的主流。在1920年代早期新文化運動的環境中，一種新的自由民主的體育精神得到鼓吹，個體鍛煉身

體、訓練自己的體育運動開始與挽救孱弱的國家命運聯繫起來。

第五章題為「我們也可以成為控制者和壓迫者」，作者一方面從「國家體育」的概念出發，介紹了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以及中國體育事業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國民黨的勢力開始滲入原本由民辦的體育事業中。在1930年舉辦的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上，蔣介石的致詞以及大會的會歌，無一不在向外界傳達，運動會的意義不只在於運動本身，更在於顯示國民政府統治下國家的統一。另一方面，作者也從「社會身體」的概念出發，特別探討了體育文化在人民大眾以及婦女之中的傳播。

第六章以1930年代的精英競技運動為一個專題，介紹了30年代各省區運動會的發展，以及由於政治原因（「九一八事變」）流產的1931年全國運動會、表現民族團結的1933年全國運動會，和遠東運動會等。第五與第六章作為一個整體，共同闡述了1930年代中國體育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發展情況。在內憂外患交迫的1930年代，中國的體育事業卻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表現為1930年、1933年和1935年三次全國運動會的召開，以及選拔運動員參加了三次遠東運動會和兩次奧運會。

不過，作者對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體育發展是持否定態度的。他認為運動會這類精英體育脫離大眾，全國運動會的種種景象是「一種奇特的釀造」，融合了「大肆渲染的民族主義，國民黨的政治宣傳和吹噓，媒體的過度轟炸，慷慨的商業主義和地區派系間的緊張對抗」。

在考察了全國運動會、遠東運動會及奧運會後，他得出結論：中國人對於體育的熱情在於它可以挽回民族自尊，所以運動會的目的不在於保家衛國、抵制侵略、強身健體的體育精神，「國家面子」最終遠遠大於「國家身體」（頁149）。

第七章「從武術到國術」，研究傳統武術在1912至1937年間的現代化過程，論述了在外來體育文化的衝擊下，武術怎樣通過尋求民族文化與現代化的交織點來求存。第八章是「經歷戰時和『解放』的體育」。作者認為，國民黨在提倡民眾體育上的一些措施，使後來共產黨紅色體育文化的組織化和意識形態化方向成為可能。

讀罷全書，讓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整本書的主題——以中華民國體育發展為主題的學術著作畢竟並不多見。這部著作以體育運動與身體文化為視角，揭示了近代以來中國個體從臣民走向公民的轉變過程，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體育是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體育史在學術上的地位卻有些模糊。近代以來的體育史，多由體育學界的專家所書寫，主要為體育學科的研究和發展服務。但在西方歷史學術界還是湧現了不少研究中國體育發展史的著作，視角多集中於體育與社會、政治之間的微妙關聯：如科拉茨 (Jonathan Kolatch) 的《中國的運動、政治和意識形態》 (*Sport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China* [New York: Jonathan David Publishers, 1972])、布勞內爾 (Susan Brownell) 的《為中國而訓練身體：道德指令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

《民族之髓》得出結論：中國人對於體育的熱情在於它可以挽回民族自尊，所以運動會的目的不在於保家衛國、抵制侵略、強身健體的體育精神，「國家面子」最終遠遠大於「國家身體」。

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內憂外患的政治形勢、救亡圖存的亡國意識給當時體育文化的發展烙下了時代印記。體育，不僅僅代表個體強身健體的希望，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輿論中，更象徵着國家力量和健康。

運動》(*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均被作者視為「至今為止英文學術界最全面的對中國體育文化的觀察」(頁5)；徐國琦的《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運動，1895-2008》(*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以清末近代體育的興起為始，2008年北京奧運為終，利用各方檔案資料，探討西方體育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它與中國努力實現國家自強、追求國際地位的關係。這些作品都着力於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語境中重新詮釋體育這一概念。而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內憂外患的政治形勢、救亡圖存的亡國意識又給當時體育文化的發展烙下了時代的印記。體育，不僅僅代表個體強身健體的希望，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輿論中，更象徵着國家力量和健康。

同時，作者在分析史料的基礎上得出的很多論斷都頗具新意。例如，作者認為大眾體育與精英體育(如奧運會)之間的關係就像蹺蹺板：愈重視奧運會，體育的大眾性就愈低；體育愈靠近學校、社區，那就愈為大眾化。然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出於種種政治目的之考慮，總是想要在所有東西之間建立聯繫，而沒有考慮奧運精神到底在何種程度上與國家精神相關。雖然國民政府在提倡開展體育事業的建設方面不可謂不盡全力，但實質上在大眾體育的普及方面成效甚微。這個問題，即使是在今日的中國，依然存在。

其次，作者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整理大量題材多樣的體育史料，從書籍、報紙、期刊雜誌，到小說、回憶錄、訪談，使得大批體育史料得以重現，為後人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礎。由此也帶來作者行文風格的多樣性。同時，作者對當事人話語的原文摘錄，徵引大量相關的圖表、照片，使讀者有回到歷史現場的感覺。另外，作者將二十世紀的中國置於全球的環境中，重點分析了蘇俄與日本對中國體育文化發展的影響，這在前人的研究中也是不多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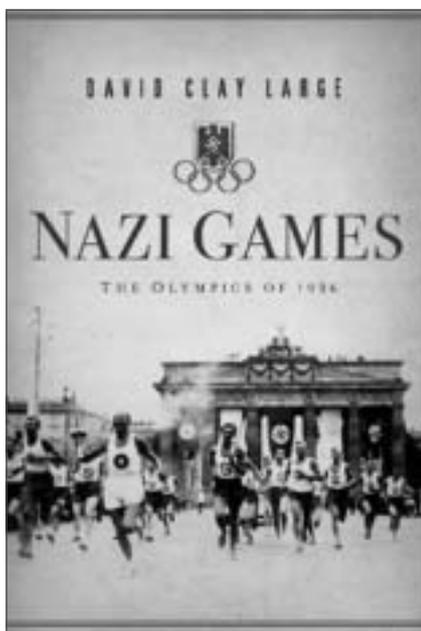
當然，書中也有美中不足之處。首先，由於全書的論述範圍很廣，以作者一人之力完成的「中華民國體育與身體文化史」，難免會有遺漏之處。僅就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全國運動會而言，作者只是重點分析了1933年的全運會，對1930和1935年的全運會都甚少提及；又將1930年在杭州舉行的第四屆全國運動會視為1929年4月的西湖博覽會的一部分，但兩者實質上的關聯其實不大。其次，作者主要從民族主義這一視角出發，探討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是怎樣走上現代化的途徑，對於運動會本身所體現的商業主義、資本主義等涉及尚淺。而且他將運動會歸類於「精英體育」，認為它與「大眾體育」是分裂的，存在不相容的關係，並未注意到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此外，雖然作者試圖從全球化的視角來審視中華民國體育發展史，並注意到其他國家，如蘇聯、日本、美國對其發展的影響，但書中所利用的史料多為中文和英文資料，對日文資料的應用也許還有可以加強之處。

西方評論界也指出了該書的一些問題。首先，作者主要關注民國時期體育團體和運動界的大事、省級以上的運動會，相對而言，對社區運動組織、學校體育教育、大眾運動機構着墨較少。因此，讀者很可能會對體育是如何在地方層面起作用並不清楚。其次，對於武術作為單獨一個章節，而不是將其融入到該書的核心篇章之中，也有學者認為是失策之處，因為這似乎與

整個民國時期中國的主流體育脫節，影響到讀者的理解 (Robert Culp, “Book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 no. 3 [2005]: 727-28)。然而瑕不掩瑜，這部著作在學術界給人們的啟迪是不容置疑的。正如書評者卡爾普 (Robert Culp) 所說，每個學習中國現代史的學生都要感謝作者在研究中華民國運動史和民族主義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 被遺忘的倫理責任

### ● 孫傳釗



David C. Large, *Nazi Games: The Olympics of 1936* (New York: W.W. Norton, 2007).

因為關心1930至40年代的極權主義與德國史的研究，筆者在檢索該領域業績卓著的美國蒙塔納州大學教授拉傑 (David C. Large) 的著述時，偶然讀到其新著《納粹的競賽：1936年的奧運會》 (*Nazi Games: The Olympics of 1936*)。與以前讀過的兩本關於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專著——門德爾 (Richard D. Mandell) 的《納粹奧林匹克》 (*The Nazi Olympics*) 和哈特—戴維斯 (Duff Hart-Davis) 的《希特勒的競賽》 (*Hitler's Games: The 1936 Olympics*) 相比，此書無疑有其超越先行研究的長處。

拉傑的新著有兩個特點：其一，利用了從歐美各國幾十所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和檔案館收藏的、前人未曾發掘和利用過的史料 (比如有關人物往來書信)，把

《納粹的競賽》不僅揭露納粹利用奧運會為其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服務，強調汲取箇中的歷史教訓；而且對那些協助納粹1936年奧運會取得成功的人們至今未受到道德、良心上的追究和譴責，提出了疑問。